

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唐代科举 与 文学

傅璇琮 著



521
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75印张 5插页 37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精)1,100

统一书号：10094·631 定价：(精)4.05元

序

这本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

巴尔扎克曾说：“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①《人间喜剧》就是这样一部内容丰赡的巨著。说它是一部历史巨著，主要是这位艺术大师写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整体形象，这整体形象包含了这个社会的思想史、情感史、风尚习俗，而这些又是通过生动形象的各种人物来体现的。

同样，“十八世纪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②《实践理性批判》是思维性极强的哲学著作，但十八世纪德国那种普鲁士式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通过思想的折光，在这本书上反映出来，而且反映得是那样的完整和深刻。这也昭示我们，文化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群体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究，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一个人、一群人，或是一个社会），站起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如果说《欧根·奥涅金》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从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甫的诗正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杜诗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而与此同时，诗人又把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画出来，使我们看到盛唐时代从通都大邑到乡野镇落各不相同的生活场景。杜诗被号称为“诗史”，就是以其深邃的历史内容和多彩的世态人情所获得的。李商隐生活在与杜甫不同的年代，那是一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使人眷恋而又充满失望的年代。李商隐的诗充分发展了主观抒情特点，但我们通过他那瑰丽奇伟而又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句，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治斗争的脉搏。中晚唐腐朽势力的猖獗，革新派的被扼杀，唐朝廷的一蹶不振，腐败的风气弥漫朝野，是李商隐悲剧的根源。作为李商隐沉博绮丽而又扑

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的背景，正是大唐帝国在激烈的自我斗争中从腐败走向灭亡的历史。在同时代找不到任何一部历史著作，能够象玉溪生诗集所揭櫫的那样，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情绪的真谛。

从研究一个作家、学者，或者政治人物着手，来展示一个时代，已经成为许多著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了，其中还曾产生过一些杰作。但是，是否可以抓住某一历史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叙述的线索，把一些零散的社会现象和人物行迹串连起来，使内容的覆盖面更大一些呢？

鉴于社会是在不断的发展，社会生活又是如此的纷繁多彩，研究方式也应有所更新，要善于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住恰当的中介环节。

由此，我想到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的头几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象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难以忘却周进这个老童生。他受了大半辈子屈辱，后来跟随一些买卖人到贡院观看，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往前推七、八百年，我们看唐代人的一则记载：

苗给事子僎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僎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

（《刘宾客嘉话录》）

这真是一则传神的小品。苗给事为苗槃，是个老练世故的官僚，在官场中混了许多年。他懂得科举入仕对保持门风家世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即使得了中风病，连话也说不出，但一听说儿子要进考，就急忙叫人给他一支笔，淡墨写了两个“入”字。有其父乃有其子，苗槃的儿子也顾不得侍奉病情危急的老父亲，赶紧入闱应试。苗槃与周进，时代不同，身分地位不同，但他们的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却又何其相似！

不妨再举一例。北宋初年人钱易，写了一部名为《南部新书》的笔记，多记中晚唐情事，其中有一则说：

杜羔妻柳氏，善为诗。羔屡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丁卷）

看来这位“善为诗”的柳氏，真是酸腐得厉害。在她眼中，丈夫的才奇不奇，是以是否及第为标准的。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写的鲁小姐。这位小姐自幼禀承庭训，把八股制艺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来一个女婿蘧公孙却是自名风流的名士，不把举业放在心上。家里人见她平时“愁眉泪眼，长呼短叹”，就劝她，说这位新姑爷真是“少年名士”，不想她却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这真是既可悲可叹，又令人忍俊不禁。

唐代人有时不免带着浪漫主义的情调来称颂进士试，他们把进士及第比为登龙门，说一个读书人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清选，莫不由兹”。张籍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这是说一旦金榜题名，就

能名扬天下。而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则是写寒士中举后的喜悦心情。但是在这些得意、喜悦的背后，却不知道有多少屡试不第的悲酸，请看贫寒士人夫妻的遭遇：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唐摭言》卷八）

这是极有代表性的唐代进士考试中的悲剧，这种悲剧对于一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并非绝无仅有。而以往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却多被忽视。

唐代进士科所取的人数，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据唐宋人的统计，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明经科较多，约一百人到二百人之间。进士、明经加起来，也不过占考试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的，绝大部分是落第者。公乘亿考了将近三十次，还有的则是终生不第。这种落第的失望与悲哀，屡见于唐人的诗文中。韩愈在回忆屡试不利、困居长安时，发出了极为沉痛的叹息：

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它牵连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朝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唐代不同，我的老师林庚先生曾以饮酒作为比喻，说“魏晋人好酒，酒似乎专为人可以忘掉一切”，“酒对于魏晋人是消极的，是中年人饮闷酒的方式；唐人的饮酒却是开朗的，酒喝下去是为了更兴奋更痛快的歌唱，所以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中国文学简史》第259—260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同样，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又与唐人不同，宋代的作家更带有学者的气质与修养。明代的知识分子，清人批评他们不学无术，游谈无根，但明代中后期文人的某种狂放不羁却非清代士人拘守于繁琐笺订之学所能及。我们闭眼一想，就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与当时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知识分子既然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描

写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

当然，运用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有一定难度的。以唐代的科学与文学来说，首先遇到的是现有的成果极少。唐代文学的研究，可资利用的成果还比较多一些，科举的研究几乎需要白手起家。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学术著作的中国科举史，当然更没有专题论著性的唐代科举史。研究唐代的科举制，还不得不以一个半世纪前写成的《登科记考》作为基本的材料。因此，我努力从头建立资料的基地，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话，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③

基于一定的考虑，我决定本书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论述的方式。我想尽可能地引用有关材料，将这些材料按各专题加以介绍。科举制牵涉的面太广，其本身也有不少细节需要弄清，我的史学修养不够，在涉猎中感到有些问题很棘手。我期待着有真正专题研究性质的唐代科举史著作的产生。我只是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本书的一小部分内容，曾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它们是《历史研究》、《文学遗产》、《文史》、《中华文史论丛》、《草堂》、《北方论丛》、《学林漫录》等。在收入书中时，则经过材料的补充和内容的增删。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充分发达的时期。唐代文化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今年八、九月间，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尔后又随会议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参观。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

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采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敦煌学的先驱者之一向达先生，在1956年初，结集其一生的心血，刊出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位老学者结合自身的经历，叙述了敦煌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他在自序中说：“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掘堙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这几句饱含感情的话语诉说了半世沧桑。到过敦煌的人，会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学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科学，变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样的不可逾越，那末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除了极少的文物遗留外，整个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复见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史癖吧。

程千帆先生为本书封面题签，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

版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帮助，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同志和西北大学中文系阎琦同志曾对本书提出过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写于北京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修改于厦门

注：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I）第95页引。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11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0页。

目 录

第一章	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1)
第二章	总论唐代取士各科……………(23)
第三章	乡贡……………(42)
第四章	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72)
第五章	明经……………(110)
第六章	制举……………(134)
第七章	进士考试与及第……………(160)
第八章	进士出身与地区……………(191)
第九章	知贡举……………(217)
第十章	进士行卷与纳卷……………(247)
第十一章	进士放榜与宴集……………(287)
第十二章	举子情状与科场风习……………(326)
第十三章	唐人论进士试的弊病及改革 ……………(381)
第十四章	进士试与文学风气……………(403)
第十五章	进士试与社会风气……………(434)
第十六章	学校与科举……………(465)
第十七章	吏部铨试与科举……………(491)

第一章

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

有关唐代科举制的研究材料，最基本的应当是唐人的登科记。但唐代的登科记，无论是唐朝人所作，还是宋朝人所作，今天都已不可得见。从总的科举史来说，特别是在登科记方面，唐代比起以后的几个朝代来，材料是最少的了。我们从《宋会要辑稿》中可以看到不少宋代科举制的原始材料，好几种宋元方志保存有宋人历年登科的名单。明清的有关材料更为繁多，《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都可给我们提供详细的登科人姓名。上千卷的《大清会典》及《会典事例》，与清代实录，关于礼部贡举、职官铨选、学校措施等，都有分门别类的档案记录。

可以庆幸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位学问面很宽广的学者徐松，编撰了一部唐代科举史的专著，给这门学科填补了空白，也给后人提供了不少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在有关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史料——登科记完全散失的情况下，徐松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和考证，著成

《登科记考》一书。《登科记考》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编年史，向人们提供了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发展演变，以及有关人物的具体活动。徐松并不以选拣几条干巴巴的正史有关条文为满足，他以其渊博的学识，注目于唐宋时期众多的杂史、笔记、诗文、小说，他想用当时生活的具体记述，来重现唐三百年间对于文人生活和文学艺术有重大影响的科举考试几个重要方面的历史情景。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看作是清代勃兴的考据学应用于学术史的一种积极尝试。

在徐松《登科记考》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让我们回溯一下唐宋时期有关唐人登科记记载的情况，探索一下学术史上前人走过的足迹，正好象我们在饱览长安的汉唐名胜之后再去观看半坡遗址，使我们可以对历史发展的链条看得更加清楚。

—

本书对所用材料的叙述，就先从对唐宋人所作的登科记的考索入手。

首先应当说明一下，唐代所谓设科取士，究竟有哪些科目。《新唐书·选举志》说：“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所谓岁举之常选，就是国家对考试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规定，并按时举行。但《新唐书·选举志》所载，虽然详细，却较凌乱。

《唐六典》、《通典》则将常贡之科大要分为六项，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又徐松《登科记考》的“凡

例”中说，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举、开元礼、童子科都算是诸科，五经、二经、三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应入明经科。这方面，还是清人王鸣盛讲得较为有头绪，他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其实若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若俊士与进士，实同名异。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①常选之外有制科。制科的具体名目更加繁多，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孝弟力田闻于乡里、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等科，据宋朝人统计，有唐一代，制科的名目大约有八十六个。^②

记录以上各科登第者，称登科记。^③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条说，从中宗神龙（705—707）时起，就有人逐年记载登第进士的姓名，称做《进士登科记》。封演在玄宗天宝时曾入长安太学读书，^④他在天宝末登进士第，^⑤太学的同学诸生就将他的姓名续记在已有的《进士登科记》之末。当时有一个叫张繅的读书人，也应进士举，初落第，出于对进士及第的羡慕，就用两手把那本《登科记》捧在头顶上，说：“此‘千佛名经’也！”从封演的记载中可以知道，从中宗时起，就有登科记一类的书，而且可以逐年增添。由于进士科尤为特出，当时就有人专记进士登科的，这种进士登科记被视为光荣簿，因而也就有可能在社会上流传。如诗人张籍《赠贾岛》诗中说：“蹇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姓名未上登科记，身屈惟应内史知。”（《张籍诗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张籍是中唐时人，可见当时登科记已盛行于社会，士人能以姓名上登科记为荣。

又据宋人《蔡宽夫诗话》所记，谓：“故事，放榜后，贡院小吏多录新及第人姓名，以献士大夫子弟之求者举者（琮按此‘求者举者’疑当作‘求举者’）。”（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页四一八，系辑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这当是礼部贡院小吏因职务所近，将当年的新及第进士姓名记录下来，以献于士大夫子弟，备他们应酬交际及将来应试的参考，有其实用的目的。这样历年积累，也就自然成为登科记一类的材料。可见在唐代，登科记材料的纂集是相当普遍的。

说到进士登科记，应该先约略谈一下唐代进士的放榜情况。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节，本书第十一章《进士放榜与宴集》有专章论述，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把有关情况先在这里谈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进士归礼部试，就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南院东墙，详情可参见五代时人王定保《唐摭言》一书。晚唐诗人黄滔有《送人明经及第东归》诗，中云：“亦从南院看新榜，旋束春关归故乡。”（《唐黄御史公集》卷三）似乎明经放榜也在礼部南院。另一种是所谓榜帖，类似后世的“题名录”，又与“捷报”相仿佛。唐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泥金帖子》条载：“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又《喜信》条载：“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所谓泥金，就是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榜上贴有这种金花，所以榜帖又称金花帖子。据王仁裕所记，则这种金花帖子至少在开元、天宝时就已经盛行了。又据宋赵彦卫所记，这种金花帖子在北宋初仍还流行，其所著《云麓漫钞》（卷二）中有具

体的记述：“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另外，南宋人洪迈也有这方面的记载，^⑥他曾获得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孙仅榜的盛京榜帖，说这种榜帖“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上面写知举者姓名、年岁、生辰，以及父祖名讳，其后写本榜状元姓名、籍贯及同科登第人。在唐代，这种榜帖有专人差送至及第进士的家乡或所在地，如《玉泉子》记赵璘进士及第，人还未回家，榜已送至所属州府。又如曹希干于咸通十四年（873）登第，这时其父曹汾为忠武节度使（治许州），

“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⑦这种榜帖备载登第者姓名、籍贯，同榜状元及同年名次，又载本科知贡举者的姓名、年岁、父祖名讳、私忌，等等，其本身已经具备成为唐人登科记的原始材料。唐代前期一些私人所编的登科记，其材料来源主要当即是通行于社会上的这种榜帖。

唐人所编的登科记，在穆宗长庆（821—824）以前，就有十几种。^⑧大抵在宣宗以前的登科记，都系私人所编。^⑨这些私人编录，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只记载了三种，那就是：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

《显庆登科记》的著者崔氏，《新唐书·艺文志》注云“失名”，生平事迹无从考知。《文苑英华》卷七三八收有赵修《李奕登科记序》，末云：“自武德至乎贞元，阅崔氏本纪，前后嗣续者在我公为多焉。顾惟寡昧，获与斯文，因濡翰而为之序。贞元七（原注一作十七）年春三月丁亥序。”同一篇文章，《全唐文》卷五三六，则变成作序者为李奕，篇名